

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研究

——基于四川藏区23县(市)1320户的调查

卢冲¹, 耿宝江², 庄天慧³, 杨浩³

(1. 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2. 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3. 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文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理论模型,使用双槛模型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四川藏区男性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较强,随着年龄的增加,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将不断降低;拥有草场、牦牛或房屋较好的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较强,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较大;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重要他人支持度、个人胜任/控制力对其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整体上来看,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通过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行为产生0.0629的正向中介效应;从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来看,旅游资源一般的县(市)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通过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行为产生0.0772的正向中介效应;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市)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主观规范通过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行为产生0.0283的正向中介效应;可以看出,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参与行为的中介效应只存在于旅游资源一般和较丰富县(市)。

[关键词]贫困农牧民;旅游扶贫;参与行为;双槛模型;四川藏区

[中图分类号]F59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省藏区多维贫困及其治理对策研究”(14XMZ006)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 by a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o ZHUANG Tianhui) (No. 14XMZ006).]

[收稿日期]2015-12-10; **[修订日期]**2016-04-06

[作者简介]卢冲(1991—),男,四川崇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贫困问题, E-mail: luchong2013@163.com;耿宝江(1975—),男,新疆新源人,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旅游扶贫;庄天慧(1964—),女,四川彭州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贫困问题;杨浩(1984—),男,四川德阳人,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贫困问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64-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2

作为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国内外旅游学界的密切关注^[1]。贫困地区开展旅游扶贫,首先考虑是否具备旅游开发的条件,其次确定适合该地区开发的旅游项目,最后让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项目,并给予相应的扶持以使其参与旅游发展而脱贫^[2]。四川藏区作为我国片区扶贫的主要战场之一,该地区藏族贫困人口聚集,脱贫难度较大。但同时,四川藏区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较大。2014年,四川省旅游提升计划明确指出,将在四川藏区打造10条精品旅游环线,以突出藏区特色文化旅游城镇为核心,打造多元化乡村体验旅游产品。2015年,国家旅游局在四川藏区选择了3个贫困村作为全国旅游扶贫试点村,积极探索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发展、增收脱贫的扶贫新方式^[3]。2015年11月,四川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大力推进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创建藏区全域旅游试验区和4大片区旅游扶贫示范区,支持创建特色旅游示范村,发挥旅游产业对增收脱贫的带动作用。统计显示,2014年四川省参与旅游扶贫的贫困户每户均增收超过500元,比全省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速度高1.8个百分点^①。旅游扶贫已经成为四川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四川藏区全面实施旅游精准扶贫的背景下,积极让贫困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提高贫困农牧民旅游扶贫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率,将有助于实现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的精准脱贫。

^① 数据来源: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局官网,四川省扶贫开发建档立卡(2014)数据汇总资料。

1 文献综述

旅游扶贫是一种能够促进贫困地区贫困主体脱贫致富的旅游发展模式,通过旅游为贫困主体产生正向效益^[4],并要求贫困主体的旅游收益要大于他们的付出成本。Butler和Curran指出在短期或长期内,旅游扶贫不仅要使贫困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得到改善,而且还要增加其工作机会,提高经济收入水平^[5]。旅游扶贫的实践中常常存在贫困人口瞄不准和参与率低的问题^[6]。Wang和Yang认为在中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区,贫困户能力缺失、旅游规划滞后、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导致贫困户参与率低的主要制约因素^[7]。León通过对23个分布在多米加沿海的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实施情况的研究发现,贫困户个人年龄、是否会第二语言等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较大^[8]。

不少学者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障碍和如何提高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进行了诸多探索。研究普遍发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对旅游扶贫参与意愿较强。但一方面,当地政府对居民旅游扶贫感知的了解不够、参与机制不完善,导致贫困人口参与程度不高,对政府旅游政策评价较低^[8-9]。另一方面,民族地区长期闭塞,贫困人口(居民)自身素质不高、个人能力有限,资源禀赋欠缺导致其参与意愿较弱,参与率较低^[10-11]。姚娟进一步对民族地区女性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调查,发现女性牧民参与意愿强烈,收入水平的增加和女性可能在旅游扶贫开发中获得参与接待、招揽等工作,使得女性对旅游扶贫的效应感受深切^[12]。杨阿莉明确提出,加强对贫困人口旅游从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以及旅游经营方式、普通话等知识和能力的培训,才能最大可能地让贫困人口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13]。

计划行为理论能够有效地分析农户参与旅游开发的行为特征。马奔和刘春济对森林景区周边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是否有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等因素,对农户经营意愿和经营投入具有正向影响^[14-15]。Dogan和李佳对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效应感知与参与意向的数理统计分析发现,贫困人口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受到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旅游发展是否了解等影响的影响^[16-17],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在不同人口特征的贫困人口之间差异显著。并且贫困人口对旅游

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参与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18]。

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核心是让贫困人口脱贫,因此,贫困人口参与是旅游扶贫的前提和核心^[19]。旅游开发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机会,但由于少数民族地处偏远地区,信息阻隔,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的意识薄弱,即表现为贫困主体无发展旅游意识和参与意愿^[20]。因此,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探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瞄准度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民族地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或行为问题实证探讨较少,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角度,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或行为的实证研究则几乎没有。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以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为调研对象,从微观层面构建贫困农牧民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1320户贫困农牧民的问卷调查数据,从贫困农牧民个体、家庭特征、资源禀赋、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方面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意愿及行为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参与意愿对贫困农牧民参与行为的中介效应,以供四川藏区旅游扶贫实施单位参考。

2 理论模型、研究方法 with 变量选择

2.1 理论模型

当个体行为受到非完全意志控制时,计划行为理论可能是目前最有效的关于行为内生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意向直接影响行为,而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Ajzen和Fishbein提出任何行为意向都是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1-22]。而个体特征以及个体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如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经验、人格等)会通过影响行为信念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最终影响行为意向和具体行为^[23]。

行为态度是由信念强度和价态评估组成。信念强度是指个体对行为结果完成的期望;价态评估是指个体对行为结果的积极或者消极结果的估计。二者的乘积则组成了某一个体的总体行为态

度。普遍认为行为态度是行为意向最有效的预测变量^[23]。行为态度可用公式表示为： $attitude \propto \sum_{i=1}^n I_i \times W_i$ ，其中， I_i 为不同强度的信念， W_i 为对应的权重。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所感受到社会压力对某一行为的支持或反对。通常认为，与决策个体关系越亲密其他个体，对行动个体的主观规范影响越显著^[24]。主观规范由规范信念和顺从动机组成。二者的乘积构建行动个体的主观规范。大量研究表明^[25-26]，主观规范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弱。主观规范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subject \propto \sum_{i=1}^n R_i \times M_i$ ，其中， R_i 和 M_i 分别表示规范信念的强度和顺从动机的强度。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并执行某种行为的容易或困难程度。知觉行为控制由控制信念和知觉强度组成，二者的乘积构成行动个体的知觉行为控制。普遍认为^[25]，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向的解释较强。知觉行为控制可以表示为： $control \propto \sum_{i=1}^n CR_i \times FI_i$ ；其中， CR_i 和 FI_i 分别表示为控制信念强度和知觉信念强度。

行为意向（也称行为意愿）是指个体打算采取某种行为的主观概率。通常表现为愿意参与的意愿程度^[26]。多数研究证明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27]。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28]：一条是行为意向是对实际行为的承诺过程，增强了行为实施的内在动因，对实际行为产生辅助作用；另一条是行为意向的形成过程，也是提高目标可得性的过程。当行为意向达到实际行为的阈值时，才会实现具体行为的实施。

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变量会通过以上 3 种因素影响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向和行为^[29-30]。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梳理，基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和计划行为理论^[31-33]，本文构建了以贫困农牧民个体、家庭特征等为基础，贫困农牧民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为重要影响因素的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理论模型。具体来看，贫困农牧民的个体、家庭特征和资源禀赋是其参与旅游扶贫的基础。贫困农牧民对参与旅游扶贫脱贫增收的态度，身边重要人物对个体参与旅游扶贫的支持度，以及参与旅游扶贫将遇到困难的胜任/控制能力是直接影响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三大因素。当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越强烈，其参与旅游扶贫的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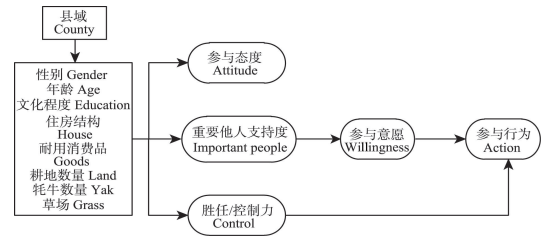


图 1 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理论模型
Fig.1 Poor farmers and herd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model

能性就越大(图 1)。

2.2 研究方法

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是以下两个过程的有机组合：第一个过程是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程度；第二个过程是参与旅游扶贫行为(即是否参与旅游扶贫)。基于这一特点，本文选择使用双槛模型，其实质上是一个 Probit 模型和一个 Truncated(截尾回归)模型的组合，它允许变量分别影响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程度和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此外，双槛模型还将零值和缺失值出现的原因扩大到了预算约束以外的其他因素。

双槛模型的形式为：

$$\begin{aligned}
 d_i &= Z_i' \theta + \eta_i \\
 y_i^* &= X_i' \beta + \varepsilon_i \\
 y_i &= y_i^*, \text{ 若 } d_i > 0 \\
 y_i &= 0, \text{ 若 } d_i \leq 0
 \end{aligned} \tag{1}$$

式(1)中， y_i^* 表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程度，它也是贫困农牧民自身效用最大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因变量 y_i^* 可以取值很小，甚至为负(反对参与旅游扶贫)。因此，在取值为零处存在删截。 d_i 表示第 i 个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假设 y_i^* 是一个潜在的指示变量，只有 y_i^* 为正值时，自身符号和 d_i 才可以被观察到。不同的自变量(Z_i' 和 X_i')和参数(θ 和 β)被用于解释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程度和是否参与旅游扶贫。其中， Z_i' 和 X_i' 包含了理论模型中出现的贫困农牧民的个体、家庭特征和资源禀赋、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重要他人支持度、胜任/控制力 3 个变量。误差项 η_i 和 ε_i 均服从独立同分布假定。式中的对数似然函数形式为：

$$\begin{aligned}
 \ln L &= \sum_{y_i=0} \ln \phi[1 - (Z_i \theta)] + \\
 &\sum_{y_i>0} \left[\ln \phi(Z_i \theta) + \ln \frac{(y_i - X_i')^2}{\sigma^2} - \ln \phi\left(\frac{X_i' \beta}{\sigma}\right) \right] \tag{2}
 \end{aligned}$$

式(2)中,等式右边第一项自然对数和对应于Probit模型的结果,若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不为零,则 $y_i > 0$,右式的第二项自然对数和对应于Truncated模型的结果^[34]。

2.3 研究区概况

四川藏区主要指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主要居住的是藏族并有少量的羌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甘孜、阿坝藏区和木里藏区分别位于四川西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四川藏区面积约25.045万平方千米,占四川省总面积的1/2以上。贫困特征,四川藏区共有国家级贫困县7个,占全省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31.82%;片区贫困县32个,占四省藏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总数的41.55%;截至2014年,四川藏区仍有贫困人口27.59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16.4%。旅游资源特征,四川藏区拥有世界级名胜风景区2个,国家级名胜风景区4个,省级名胜风景区24个,旅游资源丰富,民族特色突出,开发潜力较大。因此,本文对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研究,可作为四川藏区,乃至全国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研究的代表。

2.4 数据来源和样本概况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4省藏区多维贫困研究课题组2015年2—4月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的问卷调查。课题组成员主要由旅游管理和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老师,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旅游管理专业大四学生组成,共计约50名。在调研前统一对师生进行了2天关于问卷和调研操作的培训。具体包括问卷每个问题含义、询问方式培训以及每个村被调查农户抽样方法的培训。在具体样本选择时,按四川藏区旅游资源和贫困县的分布特征进行匹配(即调研县必须为片区贫困县,且至少拥有一个世界级、国家级或省级风景名胜点),选择了旅游资源丰富且贫困人口较多的九寨沟县、色达县、稻城县、康定市、若尔盖县、松潘县、黑水县、汶川县、马尔康县等23个藏区县(市)作为调研样本县(市)。抽样调查的片区贫困县总数占4省藏区连片特困地区四川片区贫困县的71.86%,可以作为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旅游扶贫研究的代表。课题组按照每个县各个乡镇经济和旅游资源丰富程度,将其分为3类,从每类中随机抽取

一个村作为被调查村。对于每个村20个被调查贫困农牧民户的确定,则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按收入从小到大排序,利用Excel随机数产生方法,从村级贫困户建档立卡名单中随机抽取20户进行调查。共计调查1380个贫困农牧民家庭,获得有效问卷1320份,问卷有效率为95.65%。

所调查的对象中藏族和羌族农牧民占96.14%,男性户主占74.47%,女性户主占25.53%。年龄以25~64岁为主,占总数的85.58%。从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的收入水平来看,贫困农牧民收入水平较低,76%的贫困农牧民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1500元。家庭固定资产和耕地数量方面,贫困农牧民家中固定资产数量较少,68.9%的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家中只有1件甚至没有大型家电或交通工具;贫困农牧民家庭的耕地面积普遍在6亩以下(占总数的78.2%),较少在6亩以上(仅占总数的21.8%)。从贫困农牧民的文化程度来看,贫困农牧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占样本总数的60.8%,高中和专科及本科以上贫困农牧民仅占贫困农牧民总数的15.3%。

2.5 变量选择

为了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应用计划行为理论,Ajzen提出问卷的测量项目要包含整体的直接测量,并且所有测量项目均采用李克特等级评分法,且态度的直接测量采用语义区分法^[35]。因此,本文采用李克特5分量法对变量进行测量,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完全不同意。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取值为0或1。0代表贫困农牧民不会参与旅游扶贫,1代表贫困农牧民会参加旅游扶贫。

2.5.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一是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用李克特5分量法来测量,非常愿意则用5分表示,非常不愿意则用1分表示。而比较不愿意、一般和比较愿意分别用2、3、4分表示。从整体上来看,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平均得分为4.38。其中,非常愿意的占53.83%,比较愿意的占34.65%,而表示一般、比较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的仅占11.12%。另一个是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不会参与旅游扶贫用0表示,会参与旅游扶贫用1表示。56.57%的贫困农牧民会参与旅游扶贫,而43.33%的贫困农牧民不会参与旅游扶贫。

2.5.2 自变量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中的3个维度,并结合到贫

困农牧民的自身特征和资源禀赋等,本文将主要分析以下4类变量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和行为的影响:(1)参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这个维度主要包含有利于增加贫困农牧民的就业、有利于增加贫困农牧民的收入以及有利于贫困农牧民受益3个指标,用李克特5分量表来表示,完全同意用5分表示,完全不同意用1分表示。(2)重要他人的支持度。这个维度主要包含周围参与旅游扶贫的人数增加,周围参与旅游扶贫的积极性增加以及地方政府积极为贫困农牧民争取旅游扶贫项目3个指标。这些指标都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完全同意用5分表示,完全不同意用1分表示。

(3)胜任/控制力。这个维度主要包含对发展旅游比较了解、有资源可用于发展旅游以及能决定是否参与旅游扶贫3个指标。这些指标也都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完全同意用5分表示,完全不同意用1分表示。(4)个体、家庭特征和资源禀赋。贫困农牧民的家庭特征和资源禀赋是其选择是否参与旅游扶贫的重要依据,并对其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影响显著。家庭特征方面本文主要选择了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家庭人均年收入4个指标。资源禀赋方面,本文主要选择家庭住房结构、耐用消费品数量、耕地数量、是否拥有草场、青稞种植面积和牦牛数量6个指标。

表1 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 1 Variable measure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变量 Variables	定义 Definition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d.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是否参与旅游扶贫 Participate	参与=0; 不参与=1	0.415	0.493	0	1
参与旅游扶贫意愿 Willingness	非常不愿意=1; 比较不愿意=2; 一般=3; 比较愿意=4; 非常愿意=5	4.380	0.804	1	5
增加就业机会 Employ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973	0.938	1	5
增加贫困农牧民收入 Revenue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4.141	0.887	1	5
贫困农牧民受益 Benefit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981	0.900	1	5
邻居和朋友参与旅游扶贫的人数增加 Neighbor1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4.309	0.965	1	5
邻居和朋友参与积极性增强 Neighbor2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4.173	0.964	1	5
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旅游扶贫项目 Projects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581	0.675	1	5
对发展旅游比较了解 Understand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723	0.358	1	5
有资源可用于发展旅游 Resource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3.867	0.918	1	5
能够决定是否参与旅游扶贫 Decide	完全不同意=1; 比较不同意=2; 一般=3; 比较同意=4; 非常同意=5	2.712	0.611	1	5
户主年龄 Age	15岁及以下=1; 15~24岁=2; 25~44岁=3; 45~64岁=4; 65岁及以上=5	3.377	0.754	0	5
户主文化程度 Education	6年及以下=1; 7-9年=2; 10-12年=3; 13-15年=4; 16年及以上=5	1.630	0.942	1	4
劳动力数量 Labors	0~1人=1; 2~3人=2; 4~5人=3; 6~7人=4; 8人及以上=5	2.193	0.592	1	5
年人均收 Revenue	500元及以下=1; 501~1000元=2; 1001~1500元=3; 1501~2000元=4; 2001元及以上=5	4.141	0.887	1	5
住房结构 House	竹草结构=1; 土坯结构=2; 砖木结构=3; 钢筋混凝土=4	2.904	0.868	1	4
耐用消费品(电视等) Goods(TV, et al)	连续变量(件)	2.101	0.617	0	3
耕地数量 Land	2亩及下=1; 2.1~4亩=2; 4.1~6亩=3; 6.1~8亩=4; 8亩及以上=5	2.436	0.148	1	5
是否有草场 Grass land	是=1; 否=0	1.62	0.893	1	5
青稞播种面积 Barley	2亩及下=1; 2.1~4亩=2; 4.1~6亩=3; 6.1~8亩=4; 8亩及以上=5	0.204	0.403	0	1
牦牛数量 Yak	连续变量(头)	0.700	0.736	0	3

注:变量中设定了23个县的县域哑变量。分别为:白玉县=1;其他为0、丹巴县=1;其他=0、稻城县=1;其他=0、德格县=1;其他=0、德荣县=1;其他=0、甘孜县=1;其他=0、黑水县=1;其他=0、红原县=1、其他=0、金川县=1;其他=0、九寨沟县=1;其他=0、康定市=1;其他=0、理塘县=1;其他=0、理县=1;其他=0、马儿康县=1;其他=0、茂县=1;其他=0、木里县=1;其他=0、若尔盖县=1;其他=0、色达县=1;其他=0、松潘县=1;其他=0、汶川县=1;其他=0、小金县=1;其他=0、雅江县=1;其他=0、泸定县=1;其他=0。

3 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分析

利用双槛模型分析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3为Probit模型分析贫困农牧民对旅游扶贫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模型4~模型6为利用Truncated模型分析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双槛模型伪判决系数为0.2076,似然比为-1086.977,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此外,Probit和Truncated模型的卡方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显著,说明双槛模型对样本数据拟合程度较高。并且,在模型3和模型6中加入了县域变量,可以看出,伪判决系数得到了较大提高。说明贫困农牧民的参与意愿及行为差异的39.79%,可以由区域特征得到解释。最后,双槛模型的系数只是反映了变量的影响方向,而边际效应才能反映变量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重点对各个变量边际效应进行分析。

3.1 贫困农牧民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

年龄变量在Truncated模型中显著且系数小于0。这说明,当户主的年龄越大,参与旅游扶贫可能性越低。参与旅游业与从事农业生产不同,朱玲发现,四川民族地区参与旅游业的门槛要求都在高中或专科以上。年龄较大的贫困农牧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都较低,并且能力有限,常常被排斥在外^[35-36]。实地调查也发现,多数年老的农牧民表示即使她(他)们想参加,但是,由于自身文化程度不高,身体健康情况较差,像酒店、餐馆等场所都不会雇佣自己。此外,四川藏区多数为高原地区,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当地农牧民衰老较快。在藏区农牧民年龄的调查中,多数农牧民提到,在藏区40岁左右就被称为老年人了。因此,年龄成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重要负向影响因素。性别变量在Probit模型中显著且系数大于0。这表明,男性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较为强烈。男性一般情况下,发展意识较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多数想自己能够通过发展生产或旅游经营等方式,来实现脱贫致富。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男性对于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较为强烈,尤其是村上主要发展旅游或是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男性普遍表示愿意参加,并会积极配合。而调研发现,女性贫困农牧民普遍对参与旅游扶贫意愿不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或家务劳动,使其表现出较强的保守性。

人均收入变量在Truncated模型中显著,但影响比较有限。可能的原因是,一般情况下,收入对是否参与旅游扶贫都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调查主体都是贫困户,收入差异较小,但同样也反映出收入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如实地调研发现,贫困农牧民想要销售土特产、旅游纪念品等前期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因此,收入水平对于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2 贫困农牧民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

住房结构变量在Probit和Truncated模型中均显著且系数大于0。这说明,贫困农牧民家庭住房结构越好,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的意愿和参与可能性就会越高。谢泽氢对四川西北民族地区贫困户的研究发现,贫困户在参与旅游时,多数会选择开旅店或餐馆等服务业。但贫困人口普遍房屋破旧、饮食卫生条件较差,不具备接待旅客的条件^[37-38]。在课题组的调研中也发现,贫困农牧民多数想对自己家的房屋进行改造和装饰,这样自己就可以开展旅店服务业。因此,拥有较好的住房将有助于提高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的意愿和参与率。是否拥有草场变量在Probit和Truncated模型中均显著且系数大于0。这表明,贫困农牧民拥有草场对于其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一致,四川藏区农牧民多数从事的都是农业或牧业。而草场、耕地和牦牛就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家庭资产)。拥有草场或耕地资源可为贫困农牧民逐步积累资金,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提供启动资金的积累。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藏区部分已经开始进行旅游发展的草原地区,草场的功能不仅是饲养牦牛,而且可以作为游客拍照观光的场地,贫困农牧民可以向使用草地的游客收取草场费,增加草场的收益。牦牛数量变量在Truncated模型中显著且系数大于0。这表明,贫困农牧民拥有的牦牛数量对其是否参与旅游扶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一致,对于牧区的贫困农户,牦牛基本是家庭的全部收入或资产。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牦牛是农牧民收入来源,并且多数农牧民还会饲养一头牦牛来供给家庭日常所需的鲜牛奶和酥油茶。因此,牦牛基本上是农牧民财富和生活的保障,可以为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提高基本的资金积累。杨阿莉和把多勋对甘南藏区的调研也发现,当农牧民拥有一定的前期资金积累时,将有助于提高其参与旅游扶贫的程度^[39]。

3.3 参与旅游扶贫态度因素的影响

“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在 Probit 和 Truncated 模型中都显著且系数大于0。这说明,当贫困农牧民感知到旅游扶贫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时,参与意愿和参与可能性都会得到提升。即贫困农牧民感知到旅游扶贫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的感知提高1个单位,其参与意愿会提高0.2%,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就会提高3.8%。这与李佳和 Zhang 的研究一致^[40-41]。民族地区居民普遍认为所居住的地区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并对其保持积极的态度,参与意愿强烈,并会受到鼓励而参与到当地的旅游发展中。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贫困农牧民普遍对旅游扶贫有正向的感知,认为旅游扶贫能够使得自己获得更多的机会,并希望能够通过旅游扶贫使自己的家庭脱贫致富。当贫困农牧民对旅游扶贫持正向态度,对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2]。

3.4 重要他人支持度因素的影响

“周围邻居或朋友参与旅游扶贫的人数”在 Probit 和 Truncated 模型中显著且系数大于0。这说明,在贫困农牧民生活中周围重要他人参与旅游扶贫的人数越多,则其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越强烈,参与的可能性越大。即贫困农牧民感知周围重要他人参与旅游扶贫人数的水平提高1个单位,则其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会提高0.4%,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会提高6.7%。四川藏区相对比较封闭,宗教信仰统一。长期以来,各个村会通过内部化、顺从、认同的过程对贫困农牧民行为产生作用。实地调研也发现,贫困农牧民对同村的孤寡老人都会主动承担赡养责任。可以看出,贫困农牧民形成了较强的主观行为规范,使得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和行为表现出较强烈的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感^[43]。因此,周围邻居或朋友参与旅游扶贫的人数越多,对于提高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参与率的作用越明显。

3.5 胜任力/控制力因素的影响

“对发展村级旅游项目比较了解”变量在 Truncated 模型中显著且系数大于0。这说明,贫困农牧民对发展旅游拥有的知识越多,其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参与的可能性越大。即贫困农牧民对发展旅游了解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则参与旅游扶

贫的可能性就业提高3.1%。根据肖建红和 Campbell 的研究^[44-45],当农牧民(居民)对旅游发展的了解程度越高,对自己旅游发展的能力或条件的评价越高,参与生态旅游的意向越大,参与的可能性越大。在调研中也发现,有些村的贫困农牧民普遍反映,对于旅游扶贫并不了解,农牧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只对农业方面比较了解。听到村上在讨论发展旅游业,参加了几次讨论才对旅游有些了解。

变量“我有资源可用于发展旅游扶贫”在 Probit 和 Truncated 模型中均显著且系数大于0。这说明,贫困农牧民自身拥有的资产情况或社会资本等对其参与旅游的意愿影响较大。即贫困农牧民自身拥有资源的水平提高1个单位,则参与旅游扶贫意愿会提高7%,而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也会提高7%。该因素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影响较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模型6中房屋结构和牦牛数量两个变量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程度相对于模型5都有所下降,而“我有资源用于发展旅游扶贫”变量从模型5的0.64提高到模型6中的0.70。说明,家庭特征变量通过支持/胜任度变量间接影响了贫困农牧民的参与行为。这与理论模型的预期一致。但是,实地调研发现,贫困农牧民拥有的牦牛数量较少,房屋较为破旧,使得贫困农牧民对自身拥有资源的感知水平不高^[46],该因素对提升农牧民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可以通过提供贴息贷款等方式得到进一步提升。

4 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检验

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的个体、家庭特征和资源禀赋、发展旅游扶贫态度、重要他人的支持和自身胜任/控制力因素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的意愿和是否参与旅游都有显著性影响。接着,本文将对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为了检验中介效应,首先,将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和控制变量对贫困农牧民参与意愿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结果;然后,将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控制变量和参与意愿(中介变量)对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2结果;最后,将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和控制变量对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3结果。

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贫困

表2 参与意愿及行为的双槛模型分析结果(边际效应)

Tab. 2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of participate in double sill model analysis results (marginal effects)

变量 Variables	参与意愿 Willingness			参与行为 Participat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模型6 Model6
年龄 Age	0.001	0.001	0.001	-0.048***	-0.041***	-0.045***
文化程度 Education	0.001	0.001	0.001	0.026*	0.028*	0.010
性别 Gender	0.004**	0.003*	0.003*	0.033	0.021	0.012
劳动力数量 Labors	-0.001	0.001	0.001	0.041*	0.023	0.025
人均收入 Revenue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房屋结构 House	0.003***	0.002**	0.001	0.091***	0.072***	0.030*
大件物品数 Goods	0.001	0.001	-0.001	0.001	0.02	0.002
耕地面积 Land	0.001**	0.001**	0.001	0.006	0.011	0.011
青稞播种面积 Barley	0.001	0.001	0.001	-0.009	-0.006	0.016
草场 Grass	0.005**	0.005***	0.001**	0.001*	0.014*	0.052*
牦牛数量 Yak	0.001	0.001	0.001	0.090***	0.115***	0.023*
增加收入 In-revenue		0.002*	0.001		0.007	0.004
获益情况 Benefit		0.001	0.001		0.004	0.021
就业情况 Employ		0.002*	0.002*		0.050***	0.038***
邻居和朋友参与人数 Neighbor 1		0.002**	0.004***		0.062***	0.067***
邻居和朋友参与积极性 Neighbor 2		0.002*	0.001		0.004	0.010
项目 Project		-0.279	0.015		-0.007	0.009
了解程度 Understand		0.001	-0.001		0.018	0.031***
资源 Resource		0.007***	0.007***		0.064***	0.070***
决定 Decide		0.003**	0.002***		0.002	-0.027
县域变量 County variables		—	控制		—	控制
Pseudo R ²	0.0210	0.125	0.2076			
log likelihood	-1343.08	-1201.19	-1086.98	-874.08	-802.94	-672.64
LR χ^2	57.49***	341.26***	569.68***	135.91***	301.61***	655.56***
N	1320	1320	1320	1240	1240	1240

注: *、**和***分别代表变量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县域变量中,在模型3和模型6中的系数分别为:白玉县(0.011*、0.718***)、丹巴县(0.004、0.576***)、德格县(0.011*、0.693***)、德荣县(0.035***、0.478***)、甘孜县(0.013**、0.6***)、黑水县(0.024***、0.293***)、红原县(0.01、0.563***)、金川县(0.013、0.531***)、康定市(0.003、0.497***)、理塘县(0.003、0.566***)、理县(0.007、0.059)、马尔康县(0.027***、0.655***)、茂县(0.021*、0.272)、木里县(0.014**、0.352)、汶川县(0.014、0.279***)和小金县(0.019***、0.537***)、泸定县(0.002*、0.002**)、色达县(0.019*、0.640***)、稻城县(0.017***、0.189**)、若尔盖县(0.023***、0.457***)、松潘县(0.02***、0.15**)和九寨沟县(0.022***、0.105*)。

表3 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全样本)

Tab. 3 Participating i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results (all the samples)

变量 Variables	模型1 Model 1	模型2 Model 2	模型3 Model 3
	参与意愿 Willingness	是否参与 Participate	是否参与 Participate
主观规范 Subjective	0.210***	0.238***	0.246***
知觉行为控制 Control	0.31***	0.008**	0.085**
行为态度 Attitude	0.091*	0.142**	0.146**
参与意愿 Willingness		0.103*	
截距项 Cons	1.929***	-3.115***	-2.783***
县域变量 Coun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和资源特征变量 Personal and resource	控制	控制	控制
LR χ^2	148.44***	120.25***	120.09***
Pseudo R ²	0.2159	0.2476	0.2473
N	1320	1240	1240

注: *、**和***分别代表变量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农牧民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对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同样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加入参与意愿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是否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依然显著。说明参与意愿产生了不完成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显著且为正。从整体上来看,四川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存在一种作用机制: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作为中介变量对参与行为产生 0.0629 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主观规范在该作用机制中起着主导作用,体现出四川藏区村级存在较强的内部规范,农牧民的行为受到集体的影响较为显著。

不同县(市)的旅游资源禀赋是不同的,为了进一步反映不同旅游资源禀赋下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的特征,本文通过不同村的旅游资源(景点数量)^①将被调查村从景点数量由大到小进行排序,分别在 33 和 66 分位处将 69 个村分为较好、一般和较差 3 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可以看出,旅游资源丰富的县,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影响显著;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对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显著;当加入参与意愿变量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对贫困农牧民是否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显著。这说明,参与意愿在贫困农牧民的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与是否参与之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显著且为正

(大小约为 0.0283)。同时可以看出,行为态度并不通过参与意愿间接对贫困农牧民参与行为产生作用,而是直接对贫困农牧民参与行为产生 0.182 的正向影响。从影响因素的大小来看,主观规范对贫困农牧民参与意愿及行为的影响最大。可能的原因是,我国长期倡导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及先行参与者对旅游扶贫的认可程度,及其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使得重要人物的期望和评价会显著性地提高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47]。

从旅游资源一般的县来看,与旅游资源丰富的县相比,二者具有相似的特点。即参与意愿在贫困农牧民的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与是否参与之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显著且为正(大小约为 0.0772)。行为态度直接对贫困农牧民的参与行为产生 0.295 的正向影响。但与资源丰富的县相比较,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与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作用机制更加显著。这可能的原因是,旅游资源一般的县,自身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长期缺乏投资,开发程度较低。因此,当地农牧民对于将要在自己所在村开展旅游业,抱有较强的希望。因此,参与意愿较为强烈,参与可能性较大。

对于旅游资源较差的县,由于自身资源缺乏,普遍对发展参与旅游扶贫并不看好,参与意愿较弱。从表 4 可以看出,资源较差的县,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主要受到行为态度的影响。这与 Lim

表 4 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组样本)

Tab. 4 Participating i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results (group sample)

变量 Variables	旅游资源丰富 Rich tourism resource			旅游资源一般 General tourism resource			旅游资源较差 Poor tourism resource		
	模型 1 Model 1	模型 2 Model 2	模型 3 Model 3	模型 1 Model 1	模型 2 Model 2	模型 3 Model 3	模型 1 Model 1	模型 2 Model 2	模型 3 Model 3
主观规范 Subject norm	0.273**	0.420***	0.412***	0.297***	0.485***	0.504***	0.140	0.128	0.140
知觉行为控制 Control	0.304***	0.198*	0.192*	0.380***	0.216*	0.215*	0.150*	0.187	0.193
行为态度 Attitude	0.071	0.181*	0.182*	0.159	0.288**	0.295**	0.041	0.425***	0.433***
意愿 Willingness		0.049*			0.114*			0.125	
截距项 Cons	5.03***	-3.656**	-3.757**	4.479***	-5.924**	-5.623**	-1.805*	-5.468**	-5.033**
县域变量 Coun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资源变量 Personal and resourc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R χ^2	569.68**	458.66**	455.74**	219.15**	90.51***	89.82***	166.31**	72.69***	72.12***
Pseudo R ²	0.2076	0.2658	0.2641	0.3135	0.2161	0.2144	0.2331	0.2747	0.2726
N	440	413	413	440	413	413	440	413	413

注:*,**和***分别代表变量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① 调查问卷共分两类,一类是农户调查问卷,另一类是村级调查问卷。村级调查问卷主要是针对被调查村的人口、收入等基本情况、旅游资源情况以及旅游收入等情况的调查。为了便于排序和分组,本文只用被调查村的旅游景点数量为标准进行排序,将被调查村分成了 3 组。

和 Dubinsky 的研究是一致的^[48]。即普遍认为行为态度是参与行为最有效的预测变量。本文认为,旅游资源的缺乏是导致旅游资源较差地区是不存在像旅游资源一般和丰富地区类似的参与意愿(行为)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原因。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利用双槛模型分析了个体、家庭特征和资源禀赋以及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对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参与意愿在参与行为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强于女性;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也逐渐降低;贫困农牧民拥有的资源禀赋对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都有显著影响。当贫困农牧民拥有相对较好的住房、草场或者有一定数量的牦牛,对于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都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主要因为拥有这些资源的贫困农牧民能够积累一些参与旅游发展的资金积累,为其参与旅游业提供基本的条件。当贫困农牧民认为发展旅游扶贫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自己对于旅游业有一定认识且拥有一定资源,此时,随着周围邻居或朋友参与旅游扶贫的人数不断增多,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会得到显著提高,参与旅游扶贫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贫困农牧民对于旅游扶贫的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通过参与意愿这个中介变量,对参与行为产生显著性的正向影响。但从不同县域拥有的旅游资源禀赋来看,这种机制显著性的存在与旅游资源禀赋一般和丰富的县,而旅游资源较差的县并不存在这种作用机制。

四川藏区旅游的逐步发展,对四川藏区的贫困程度产生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并成为四川藏区精准扶贫的主要途径之一。精准的让贫困农牧民受益是四川藏区开展旅游扶贫的核心,贫困农牧民参与是开展旅游扶贫的关键^[49]。为了提高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参与率。首先,精准培训,补齐年轻女性贫困农牧民参与短板,提高其旅游扶贫参与意愿。年轻女性在民族服饰、手工技艺、民族舞蹈方面具有优势,并且接受知识的能力较强,但由于长期从事务农和家务活动,缺乏时间和机会进行旅游相关知识的培训。因此,可以通过旅游相关知识的讲座和服务礼仪、民族技艺、舞蹈等技能培

训,增强年轻女性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能力。其次,创造基本条件,破除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门槛障碍。贫困农牧民普遍缺乏资金和相关资源,导致贫困农牧民多数不具备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条件。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符合条件(如有草场、牦牛等)的贫困农牧民给予贴息贷款等帮助,为其提供参与旅游扶贫的初始资金。最后,加强旅游宣传,以旅游扶贫促藏区脱贫致富。主观规范对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影响较大,即当贫困农牧民周围重要他人参与旅游扶贫对于提升其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及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四川藏区有些地区由于相对封闭,当地政府和居民对旅游扶贫了解较少,并没有认识到旅游对于扶贫的作用,参与意识较弱。因此,加强对旅游业的宣传,强化政府和农牧民对于旅游扶贫的认识,全面了解贫困农牧民旅游扶贫的参与意愿,积极引导,提高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意愿,将有助于带动更多的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Adam B, Jorge S A. Tourism and poverty relief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1): 107-126.
- [2] Zeng B X, Ryan C. Assisting the poor in China through tourism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research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2): 239-248.
- [3] Li Yimin, Jiang Rui. The study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u River Grand Canyon [J]. *Human Geography*, 2010, (6): 1331-134. [李益敏, 蒋睿. 怒江大峡谷旅游扶贫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6): 131-134.]
- [4] Schilcher D. Growth versus equity: The continuum of pro-poor tourism and neoliberal governance [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7, 10(2): 166-193.
- [5] Butler R, Curran R O, Gorman K D. Pro-poor tourism in a first World urban setting: Case study of Glasgow Gov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 15(5): 443-457.
- [6] Wang H, Yang Z, Chen L. Minor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 case of Kanas Tuva Villages in Xinjiang, Chin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6): 759-764.
- [7] León Y M.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s Coastal Areas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43(2): 340-359.
- [8] Li Yanqin. Community residents attitude of differenti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Sino-Russian border village room of Wei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11): 2030-2042. [李燕琴. 旅游扶贫中社区居民态度的分异与主要矛盾——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11): 2030-2042.]

- [9] Guo Ling, Wang Zhizhang. Institution embeddability and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case of study of the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of Lugu Lake [J]. *Tourism Science*, 2014, (2): 12-22.[郭凌, 王志章. 制度嵌入性与民族旅游社区参与[J]. 旅游科学, 2014, (2): 12-22.]
- [10] Lü Jun. Analysis on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system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J].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2, (6): 118-128. [吕君. 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系统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2, (6): 118-128.]
- [11] Yao Juan, Cheng Biao. Ecological tourist area minority herdsmen and settlement of engineering attitude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Tianshan and Nalati of Xinjiang[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7): 28-34. [姚娟, 陈飙. 生态旅游区少数民族牧民对定居工程及参与旅游的态度研究——以新疆天山天池、那拉提为例[J]. 旅游学刊, 2010, 25(7): 28-34.]
- [12] Yang Ali, Ba Duoxu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ority areas : A case study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Gansu Province [J].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Edition*, 2012, (5): 131-136.[杨阿莉, 把多勋. 民族地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的构建——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2012, (5): 131-136.]
- [13] Ma Ben, Liu Lingyu, Duan Wei, et al. Ecotourism management behavior of farmers living by scenic forest areas: A case study of Qinling in Shaanxi Province [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5, 14(6): 653-660.[马奔, 刘凌宇, 段伟, 等. 森林景区周边农户生态旅游经营行为研究——以陕西秦岭地区为例[J]. 农业经济管理学报, 2015, 14(6): 653-660.]
- [14] Liu Chunji, Gao J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s a model to explai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positivity toward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of Chongming Island [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2, (7): 56-64.[刘春济, 高静.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行为意向研究——以崇明岛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 (7): 56-64.]
- [15] Dogan G. Resident attitudes a 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h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 79-105.
- [16] Lee K C, Back K J. Pre and post-casino impact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4): 868-885.
- [17] Teye V, Senmez S F, Sirakaya E.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 (1): 79-105.
- [18] Russell P. Community-based tourism [J]. *Travel and Tourism Analyst*, 2000, (5): 89-116.
- [19] Liu Xiangming, Yang Zhimin. Some reflection on Chinese "the aid the poor program by tourism"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22(2): 241-244.[刘向明, 杨智敏. 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几点思考[J]. 经济地理, 2002, 22(2): 241-244.]
- [20] Ajzen I, Fishbein M. Attitudinal and normative variable as predictors of specific behavior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3, 27(1): 41-57.
- [21]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 [22] Sheeran P, Trafimow D, Finlay K A, et al. Evidence that the type of person affects the strength of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intention relationship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2, (41): 607-630.
- [23] Lim H, Dubinsky A J.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recidivism: The role of personal norm in predic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re-offending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22(10), 839.
- [24] Uysal U, Sirgy M J, Woo E, et al.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in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3: 244-261.
- [25] Rivis A, Sheeran P. Descriptive norms as an additional predictor in the theory of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J]. *Current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Learning, Personality, Social*, 2003, (3): 218-233.
- [26] Armitage C J, Conner M.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view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 40(4): 471-499.
- [27] Zeithaml V A, Berry L L, and Parasuraman A. The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service quality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60): 33-46.
- [28] Ajzen I, Czasch C, Flood M G. From intentions to behavior: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commitment, and conscientiousness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39(6): 1356-1372.
- [29] Gollwiter P M.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 Strong effects of simple plan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9, 54(7): 493-503.
- [30] Simon F. Consumer adoption of No Junk Mail sticker: An extended planned behavior model assessing the respective role of store flyer attachment and perceived intrusiveness[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16, (29): 12-21.
- [31] Natalia L M. Gender difference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willingness to pa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6, 45(2): 165-175.
- [32] Duan Wenting, Jiang Guangrong. The review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Progress*, 2008, (2): 315-320.[段文婷, 江光荣. 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08, (2): 315-320.]
- [33] Wang Jing, Yang Yi, Fu Lingfei, et al.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Health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2011, (12): 290-291.[王静, 杨屹, 傅灵菲, 等. 计划行为理论概述[J].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2011, (12): 290-291.]
- [34] Yan Yan. 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produce and produce[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4, (7): 113-129. [闫岩. 计划行为理论的产生、发展和评述[J]. 传播学研究,

- 2014, (7): 113-129.]
- [35] Newman C, Henchion M. A double-hurdle model of Irish household expenditure on prepared meals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3, 35(9): 123-131.
- [36] Ajzen I.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2(4): 665-683.
- [37] Zhu Ling.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ibet[J]. *Scien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5, (1): 110-117. [朱玲.西藏农牧民区的公共卫生服务[J].财经科学, 2005, (1): 110-117.]
- [38] Zhang Wei, Zhang Jianchun, Wei Hongyan. Benefit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Causeway Village Acenic Area in Anhui Province [J]. *Tourism Tribune*, 2005, (5): 43-49.[张伟, 张建春, 魏鸿雁.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益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 2005, (5): 43-49.]
- [39] Xie Zedong, Ma Zunping, Ru Mo. A study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orthwest Sichuan nature reserve near community [J]. *Ecological Economy*, 2013, (9): 140-145.[谢泽复, 马遵平, 如么.四川西北部自然保护区比邻社区旅游扶贫研究[J].生态经济, 2013, (9): 140-145.]
- [40] Li Zhongbin. The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national area personnel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J]. *National Bulletin*, 2015, (6): 15-21.[李忠斌.民族地区贫困人员参与旅游扶贫的障碍与对策[J].民族论坛, 2015, (6): 15-21.]
- [41] Li Jia, Zhong Linsheng, Cheng Shengkui.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n the effect of poverty elimination by tourism: A study on San Jiang areas in Qinghai province [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8): 71-76.[李佳, 钟林生, 成升魁.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益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J].旅游学刊, 2009, 24(8): 71-76.]
- [42] Zhang H, Lei S L. A structural model of resident's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ecotourism: The case of a wetland communit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4): 916-925.
- [43] Khamfeua S, Toshiyuki T.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towards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Phou Khao Khouay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central Lao PDR [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1, 21(8): 92-100.
- [44] Jia He, Wang Yonggui, Liu Jiayuan, et al. A research of reference groups to consumers decision-marking [J]. *Foreig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8, 30(6): 51-58.[贾鹤, 王永贵, 刘家媛, 等.参照群体对消费者决策研究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8, 30(6): 51-58.]
- [45] Xiao Jianhong, Xiao Jiangnan. A study of based on microeconomic effect of pro-poor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research for distributed in Liupansha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xperimental area[J]. *Social Scientist*, 2014, (1): 76-80. [肖建红, 肖江南.基于微观经济效应的面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模式研究——以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实验区为例[J].社会科学家, 2014, (1): 76-80.]
- [46] Campbell L M. Ecotourism in rural developing communiti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3): 534-553.
- [47] Qiu Shuoli.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Possibility, important, and mode selection[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3, (5): 148-150.[邱硕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 可能性、重要性及模式选择[J].贵州民族研究, 2013, (5): 148-150.]
- [48] Luo Che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safe food analysis framework: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 *China Rural Survey*, 2010, (6): 22-34.[罗丞.消费者对安全食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J].中国农村观察, 2010, (6): 22-34.]

Research on Impoverished Tibetan Farmers' and Herders'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in Participating in Pro-poor Tourism: Based on A Survey of 1320 Households in 23 Counties (cities)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LU Chong^{1,2,3}, GENG Baojiang^{1,2,3}, ZHUANG Tianhui^{1,2,3}, YANG Hao^{1,2,3}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2. College of Tourism,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3. Southwest Center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targe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radication, pro-poor tourism is key to lifting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out of pover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se areas building comprehensive pro-poor tourism experimental zones and giving play to the role of tourism in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and lifting them out of poverty, this paper explores ways to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and participation of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in pro-poor touris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ichuan's Tibetan areas in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in pro-poor tourism and applies the double-threshold model to the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impoverished Tibetan farmers and herders to take part.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In Sichuan's Tibetan areas, impoverished male farmers and herders show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ro-poor tour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articipating in pro-poor tourism decreases with the age of the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who own grassland, yaks or superior homes show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ro-poor tourism and a greater possibility to participate. The willingness of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to participate in pro-poor tourism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behavioral attitude towards pro-poor tourism, support from significant others and individual competence/control. On the whole, behavioral attitude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subjective norms have, through a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 positive mediating effect of 0.0629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in pro-poor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chness in tourism resources, behavioral attitud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subjective norms have, through a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 positive mediating effect of 0.0772 in counties (cities) with medium tourism resources, while that figure is 0.0283 in counties (cities) with rich tourism resources. This shows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s valid only in counties (cities) with medium or rich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utlined abo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proposals. First, better skills training should be provided to impoverished young female farmers and herders on tourism-related knowledge, Mandarin language ability and service etiquette. Second, the talent of impoverished female farmers and herders who regularly don ethnic costume and participate in dance should be tapped into, and well-targeted tourism programs with Tibetan features should be developed. Third, funding should be provided to lower the threshold for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to participate. Fourth,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publicizing favorable policies on pro-poor tourism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nd, pro-poor tourism will help lift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in Sichuan's Tibetan areas out of poverty.

Keywords: impoverished farmers and herders; pro-poor tourism; participation behavior; double-threshold model;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责任编辑:刘鲁;责任校对:王玉洁]